

國家葬禮

1976年9月18日下午3點，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站滿了一排排衣着整齊的工人和士兵。他們沉默不語，低頭默哀。當時，中國已有接近10億人口，人們自發在廣場、村莊、工廠、院校和各單位組織起一場全國範圍的緬懷活動。毛澤東已於九天前逝世，享年82歲。人們根據事前的安排各自站好，低下頭默哀三分鐘。毛澤東的指定接班人是當時名氣並不大的華國鋒。紀念儀式上，華國鋒的致辭充滿了對已故國家主席的溢美之詞。毛澤東自1930年代早期就領導中國共產黨，並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全面主導了國家事務。黨的領導集體莊嚴地站成一排，旁人看來一片團結景象。

然而，這種表面上的團結在10月6日就開始破裂，華國鋒對毛澤東生前的激進派追隨者動手了。他與其他黨內高層秘密商議，命令其安保人員抓捕毛澤東的核心政治盟友。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她的居所被抓，而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被告知要參加一次高層會議，當他們陸續抵達時，驚慌失措的三人被武裝警衛一個接一個地帶走並拘禁起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幾人對毛澤東鞍前馬後。十年浩劫讓中國政權癱瘓，經濟衰退，受迫害和死難者達到數百萬之眾。被抓捕的四人都是當時中共十六人政治局的成員，參與黨和國家核心政策的制定，而王洪文和張春橋更是位列政治局常委，分別排名第二和第四。不久，四人被定性為「四人幫」，被指控犯下反革命顛覆罪行。而事實上，他們所做的其實只

是在毛澤東在世時完成他的指令。在去世時，毛澤東依然是革命正當性的象徵，但這是一場直接針對其政治遺產的核心要素的政變。四人幫的幕後主導恰恰是毛澤東自己。

27年前的1949年10月1日，55歲的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對着人群莊嚴宣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人們相信，長達一個世紀的經濟蕭條、政治動盪、外強入侵、殖民侵略和血腥內戰終將過去。20世紀上半葉的絕大多數時間裏，中國可謂是一個失敗的國家，希望建立憲政共和卻慘遭失敗，留下千瘡百孔。¹而在這之前的半個世紀裏，中國則是一個失敗的多民族帝國。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朝（滿清）於1644年建立，在18世紀達到繁榮頂峰，但是卻在19世紀後期走向衰敗，同時面臨着大範圍內部叛亂和外強入侵。²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歷史意義並不在於無產階級打敗了資產階級，也不在於共產主義戰勝了資本主義，其真正的歷史意義在於：新中國的成立標誌着一個能夠參與世界政治競爭、抵禦外部侵犯的現代中國的崛起。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第一次能夠有效地管轄自身領土，保證邊境安全，並擁有了處置小範圍內部叛亂的能力。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管理中國社會中農村和城市事務的不再是鄉紳士族，而是領薪水的國家官員。這些官員都是國家層級政權的組成部分，由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有效領導，並將政令傳達至最基層的普通大眾。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也將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視作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一部分。而更深層面上，這標誌着中國第一個現代國家的誕生。

過去的一個世紀則不堪回首。1950至1864年的太平軍起義聲勢浩大，在十多年間波及清朝東南部四分之一的國土，起義建立起了太平天國，在它的興衰過程中戰亂頻仍，奪走了超過2,000萬人的性命。³羸弱的滿清政府不僅要鎮壓地方叛亂，還在多場反抗外強的戰爭中屢屢失利。1900年，以抗擊外侮為旗幟的義和拳運動爆發，儘管義和拳組織受

1 Nathan (1983), Wilbur (1983).

2 Kuhn (1980), Rowe (2009, 149–296).

3 Kuhn (1978), Platt (2012), Spence (1996).

到清廷支援，卻仍舊在殖民國家的聯盟前敗下陣來，滿清政府從此一蹶不振。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看似以較為溫和的方式結束了帝制，實質上只是為早已奄奄一息的清王朝畫上了一個名義上的句號。⁵

人們試圖建立一個現代化的中國，然而很快就失敗了。在國家議會選舉中，國民黨獲得了勝利。宋教仁是該黨的創始人，在選舉勝利中功不可沒，卻在之後不久被人暗殺。幕後主使是袁世凱，此人作為曾經的清政府官員，正欲謀求自身的獨裁統治。⁶中國很快四分五裂，在地方割據和軍閥對抗中成為一盤散沙。⁷1920年代，兩大革命政黨尋求聯合，希望以武力手段重新匡扶中國：一方是中國國民黨，由孫中山和蔣介石先後領導；而另一方是中國共產黨，最終由秉持激進主義的湖南游擊領袖毛澤東領導。在1920年代中期，國共兩黨精誠合作，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共產黨宣導的社會革命讓國民黨內的有產階級政治精英們惶恐不已，國共合作很快破裂，在1927年蔣介石發動的一場旨在清洗共產黨人的閃電突擊行動中，數以千計的人遭到處決。⁸

血腥的國共衝突持續了十多年之久，共產黨在1930年代中期幾乎被全數剿滅。而此時，命運的天平突然受到外部干擾：日本軍國主義入侵，於1931年全面佔領了東三省（滿洲里）並在1937年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國民政府剛剛建立就遭到巨大衝擊，國家滿目瘡痍，大約1,200萬人死於非命。⁹

1945年，美國分別在長崎和廣島投下原子彈，日本投降，短暫的喘息之後，全面內戰爆發。國民政府在戰時遷往位於西南腹地的陪都重慶，此時緩過氣來，將矛頭掉轉，直指在抗戰中發展壯大的共產黨。在對日作戰中，共產黨在中國北部持續進行着小規模地下抵抗運動，避免

4 Esherick (1987), Silbey (2012).

5 Rowe (2009, 149–296) 對此有非常好的綜述總結。

6 Young (1983, 217–228).

7 Ch'i (1976), Nathan (1976), Gasster (1980).

8 Isaacs (1961), Wilbur (1983).

9 Mitter (2013, 5–6).

4 了與日軍的正面交鋒。內戰爆發初期，國民黨優勢明顯，但中後期節節失利，並在東三省的一系列會戰失敗之後開始迅速解體。當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大陸的國民黨勢力已經被基本掃清，殘餘力量退守台灣島，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已進軍南部和西部的偏遠省份，完成最後的佔領工作。

無疑，國人都希望新中國的成立能結束20世紀上半葉以來的殘局，迎來國家團結、和平和經濟發展的新時代。但是，這些希望很快就破滅了：革命時代遠未結束，事實上，才剛剛開始。其即將帶來的災難遠遠超出了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的想像。

被視為定義毛澤東政治遺產的兩大主要破壞性運動分別為1958至1960年的大躍進和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其中，文化大革命前四年帶來的破壞是史無前例的。大躍進中，全國人民都被調動起來，夜以繼日地工作、不斷打破生產紀錄，並試圖在短短幾年內超過世界上的其他發達經濟體。大躍進中，黨領導下的國家近乎無所不能，這一偉大壯舉在十年前的人們看來不敢想像，對於許多國家而言也是天方夜譚。然而，運動的結果竟是一場災難：這出乎中國領導人的預料，更讓運動的發起者大失所望。在大範圍人為造成的饑荒中，有接近3,000萬人死去，工業發展嚴重倒退；直到1960年代中期才緩過氣來。

5 大躍進帶來了經濟倒退、人口失衡的災難，很快，文化大革命又帶來了政治上的大混亂。1966年，毛澤東鼓勵學生紅衛兵攻擊黨內要員，些許猶豫後，又允許工人參與到逐漸壯大的攻擊毫無抵抗之力的地方黨政官員的浪潮中。至1967年1月，全國絕大部分地區的人民政府機構近乎癱瘓，在之後的兩年內才緩慢地得以重建，其中還不乏暴力事件。在此期間，各造反派聯合前來恢復秩序的各部隊，形成複雜的聯盟關係，相互爭權奪利。許多地方人民政府功能盡失，彷彿回到了內戰時期。中央發出號召，希望相互鬥爭的造反派可以「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勝利旗幟下」實現團結統一，但收效甚微。直到部隊進駐並強力恢復秩序，文革的這一混亂階段才得以結束。

1968年夏天，中國絕大部分地區都實行了戒嚴和軍事管制，許多

市民都覺得鬥爭已經結束，社會安定即將到來。然而不幸的是，武裝部隊和人民政府又開始聯手，以越來越強硬的手段打擊他們的假想敵：階級敵人和政治野心者。這一舉動雖然有效重建了政府權威，但也讓數百萬人遭到刑訊逼供甚至肉體折磨。直到林彪神秘死亡，一系列事件才最終結束。當時的林彪是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被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卻在1971年9月離奇死亡。軍隊從民政部門撤走後，中國社會進入徘徊期，活躍在1960年代後期的那些紅色鬥士們又開始派系鬥爭，不時造成地區動盪。這一局面一直持續到1976年4月，北京和其他城市爆發反對毛澤東政策的抗議活動。而僅僅六個月後，毛澤東與世長辭。

這就是1976年9月天安門廣場盛大集會的歷史背景，厚重而複雜。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領導人中，有的在文革期間支持毛澤東的政策，狂熱地攻擊曾經的同志，踐行毛氏革命的路線並詆毀那些將發展生產、提振民生置於革命之上的人；有的在這場風暴中得以全身而退；當然，也有的不僅丟了官職、飽受屈辱，甚至妻兒家屬也跟着喪命，他們中的有些人在長期關押和流放後才被召回北京，從1970年代開始肩負重建秩序的任務。毛澤東維護自身政治遺產的最終計劃，在其死後短短幾年間就以十分戲劇化的方式被徹底瓦解。對於一個屢屢力挽狂瀾，後又將中國置於二十多年極端破壞與無謂爭鬥的國家領導人來說，這無疑是最徹底的失敗。毛澤東政策的破壞性讓中國千瘡百孔，並促使毛的繼任者們開始重新思索。在接下來的30年間，他們將把中國帶到驚人的新道路上去。

本書希望講清這些事件和該時期其他的關鍵變革。最近的研究對國家領導層是如何鬥爭、背後的意圖，及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的影響都已有深入的探討。我將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但我不想贅述歷史事實，而是關注事件發生背後的原因。我的分析核心自然是毛澤東本人：他到底想要達到什麼目的？方式如何？又是什麼想法或心態促使他這樣做？本書的核心論述是：無論毛澤東想做些什麼，他的初衷與事態最後的走向通常是背道而馳的，最後的結果不僅出乎眾人的意料，也與毛本人的

想法南轅北轍。為了解其中原因，我們需要首先探討在1948至1949年間依靠武裝力量統一中國大陸的共產黨的革命機構組成，以及在漫長鬥爭中共產黨所獲取的歷史遺產。我們理解共產黨是如何組織的，如何發展新黨員，如何獎勵有功者，又是如何懲處有過者的。毛澤東及其他領導人從蘇聯照搬來了經濟制度，並認為這是中國快速實現工業化的關鍵，但我們要充分理解其中存在的固有缺陷。這兩大組織體系——黨的組織體系和蘇維埃計劃經濟體系——是毛澤東時代鬥爭與衝突的核心。毛的許多不滿就是從此二者中來的，他的目標也因此屢屢擱淺。在許多人看來，毛澤東是一個被古板的、不合時宜的革命意識形態所左右的人物，以至於屢屢犯錯、常常顯得缺乏責任。然而，毛的個人失誤並不能幫助我們解釋歷史為何會以如此面貌發生。我的敘述將從毛對中國社會的干預入手，緊接着再分析干預的結果以及對他所締造的政權和中國社會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在本書接下來的五章中，我將詳細探討歷史跌宕起伏的發展。首先要解釋的是：中國如何在1947年以後迅速成為強大、統一、特色鮮明而又存在巨大缺陷的民族國家。在第二章中，我將介紹共產黨漫長的發展之路，講述該黨如何發跡，如何在鬥爭中吸取經驗並影響後續的發展。共產游擊和對日作戰為新中國成立奠定了核心基礎，但是這一部分我不作重點講述。在戰時根據地延安，中國共產黨開始高強度的斯大林化，毛澤東吸收了斯大林時代共產主義的核心理念，尤其是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的綱領（很長時間以來人們一直以為這是毛自己的創造）。在延安根據地，共產黨繼續強化其策略，對黨員的忠誠和服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達不到標準的黨員遭到懲處。這一措施雖然為黨帶來了巨大的力量，但過於極端，也埋下了未來的隱患。1940年代後期，游擊戰早就被摒棄，取而代之的是大規模調動全國人民的策略，讓民眾支援以傳統戰爭為主要方式的國共內戰。這一改變也深遠影響着1950年代政權的建立和鞏固。

1950年代，政權處在建設之中，社會革命也遠沒有停止。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別簡要介紹了當時城市和鄉村的變革。歷經好幾個世紀的地

租制度，連同建立在其基礎上的社會結構，在短短幾年間就被摒棄。地主制度和佃戶體系消失了，剝削他人的土豪鄉紳也被處置。中國迅速變成了一個獨立小農國家。而在隨後的幾年間，土地卻又被收回國有，農民被要求加入農村合作社。城市生活也被改寫。選擇留守大陸的店主、商人和富裕資本家們的財產盡被沒收，私營企業不是併入政府管理的合作社就是被改造成國有企業。鄉鎮居民都需要登記在冊並按要求上戶口，因此與所居社區緊密地綁在了一起。團夥犯罪、武裝黑幫曾經讓中國城鄉社會飽受摧殘，現在都已銷聲匿跡，販毒、賣淫和強收保護費的現象也被清除。城鄉社會歸於平穩，恢復了秩序。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建立了嶄新而高效的民族國家，並希望以此徹底解決社會的公平與安全問題，這兩大問題長期以來困擾着中國人民。

在1950年代的建設中，這種新的國家秩序顯現出濃烈的蘇維埃色彩。1920年代，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建立起了由國家主導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第五章便描述了中國是如何迅速照搬這種模式的。現在看來，這一決定注定是錯誤的，因為這種發展模式有其深層的缺陷，最終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取得成功。但是在1950年代初期，這一缺陷還遠未顯現。這種模式給蘇聯帶來了飛速的工業發展，幫助蘇聯抵禦了納粹德國的入侵，在戰後依然發展強勁，並為蘇聯創造了強大的軍事實力，並威脅到西方列強。中國激進地採取了這種體制，但是在這種體制下，存款率高、投資率低，因此消費和生活水準都非常低，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僅僅略好於勉強糊口的水準。國家實行配給制，貨品供應短缺，住房條件糟糕，公共設施落後，這些問題一直到毛澤東時代結束都沒有妥善解決。

在所有這些根本性的改變之下，1950年代最為重要的一個變化是：中國共產黨的權力意志滲透進政府、社會機構和企業的方方面面。這一趨勢在第六章有詳盡討論，學界對此有廣泛的認同，但是並未深究其中原委。共產黨並非尋求控制一切，關注的只是政府要害部門，關乎資源調配的核心機構，以及鍛煉未來精英的平台。黨的組織迅速學會如何調節資源部署、分配晉升機遇。這一舉措迅速改變了民眾入黨的動

機，並且最終改變了黨員身份的意涵和人們入黨的動因。在共產黨還未鎖定勝局之前，入黨需要十足的奉獻精神，要冒人身安全的危險，甚至面臨死亡的威脅。而在1950年代，情況可就大不一樣了：黨員身份有助於職業發展，甚至可以更輕易地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如果一個人在年輕時就能入黨，那麼他很有可能獲得一份有權有勢的工作，為親戚後代謀取更多的特權。當然，要想始終能獲取這些好處，就必須表現得對黨忠誠，服從組織。

在1940年代，共產黨是紀律嚴明、充滿革命精神的組織，可是後來，入黨成為人們謀求自身發展的途徑，黨的架構成為裙帶關係的工具，這一趨勢讓國家領導人十分頭疼。毛澤東也為這一問題深深苦惱，其政治設計中可能最重要的一條綱領由此形成。然而奇怪的是，我們將會看到，毛澤東並不認為這種趨勢是層級官僚體系、控制不動產權、壟斷晉升機會而導致的必然結果，相反，他認為這來源於資本主義的復辟。毛澤東對事態的判斷出現了偏差，以此提出的應對方案不僅沒有達到預期目標，反而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他想極力糾正這一現象，但是直至其逝世也沒有解決。

9 前面的幾章內容為毛澤東晚年的動盪局面做好了鋪墊。在這幾章中存在着一個驚人的共性：事情的結局總是事與願違，和毛澤東的初衷背道而馳。最後他不得不因此撤回政令，做出妥協，甚至改弦更張。1956年2月，赫魯曉夫主持召開蘇共二十大，從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從第七章開始，本書將敘述此後20年的大事，討論中國對蘇聯陣營劇變所做出的反應。赫魯曉夫的批評讓許多地處東歐的蘇聯衛星國家的領導人不知所措，他們之前都忠實地踐行斯大林時代的政策。毛澤東也身處其中，仿效斯大林的做法，搞個人崇拜，並建立起特色鮮明的紅色政權。相比於赫魯曉夫，毛澤東希望更勝一籌，推行屬於他自己的自由化進程。1957年2月，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下，毛澤東自信地鼓勵普通老百姓積極建言、批評國內黨政幹部的工作，希望以此「糾正」黨的行為，緩和民眾心中的不滿情緒，避免重蹈東歐各國的覆轍。沒想到，事與願違。在短短的幾週內，原本膽怯的民眾開始大規模地表達不

滿，大有否定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反對獨裁式統治之勢。師生們組建起獨立的報刊和社團，舉行集會並在校園中發表演講。工人們也變得活躍起來，要求漲工資並獲得選舉權益，各城市開始爆發罷工。農民從剛建立不久的農業合作社中退出，年輕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也參與到這場聲勢不斷壯大的反對活動中。

毛澤東當時非常自信，認為當時共產黨面對公開批評沒有什麼好害怕的，可是他錯了。當年6月，毛澤東撤銷了自己的政策，共產黨開始採取反制措施，並常伴有報復行為。在一場巨大的反右傾運動中，許多批評者被當成目標對象，受到反黨、反動和反革命的指控。那些或發表過批評意見、或參與過有組織抗議活動的人都受到批鬥，還沒有審判就已經被家人朋友孤立。他們丟了工作，被迫到農業合作社勞動，或是蹲了大獄，接受勞改。部分學生運動和工人罷工領袖被處決。還有許多年輕黨員，出於對黨的忠誠和理想主義的想法，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批評糾正黨的不良作風，最終也在這場反右傾運動中受到牽連。這是最後一次坦誠的批評運動，直到1970年代後期，人們才重新站出來，發自內心地對黨的統治發表政治批評。

毛澤東依然迫切地想要證明自己的能力，要以嶄新的、勇敢的方式解決社會主義存在的問題。反右傾運動還未結束，毛就發動了一場大範圍的工業化運動：大躍進。第八章着重討論了這一政策，中國共產黨充分利用先前對國家各層面建立起的管控，鼓勵工農大生產。黨員幹部督促人民夜以繼日地工作，只為完成那些誇張而虛高的糧食、鋼鐵等的生產目標。大躍進最終造成了生產亂象和資源浪費，在浮誇的生產指標和極大的政治壓力下，許多官員不得不虛報產量。1959年7月，局勢已經十分明朗：大躍進帶來的經濟破壞已經無法避免，黨內高層開始思索該如何糾正他們的政策。毛澤東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似乎準備更改政策方向。時任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將軍向中央寫了一封坦誠的書信，列舉大躍進的錯誤，毛澤東卻本能地捍衛自己的路線。彭德懷被定性為叛徒，並丟了官職。毛澤東執意繼續大躍進的路線，並發動第二次反右傾運動，凡是發表過批評或懷疑過中央政策的人都捲入其中。因此，大躍

進又進行了一年，饑餓甚至席捲了大城市，農村的饑荒則更為嚴重，餓死了上千萬人之多。

這是毛澤東連續犯下的第二次錯誤，但相比於第一次「百花齊放」運動，這次錯誤所造成的悲劇更為嚴重。大躍進的破壞和之後的餘波又迅速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這些事件在第九章都會詳細論述。毛澤東允許黨內其他高層修補經濟上的破壞，毛的副手劉少奇直白地分析了大躍進的失敗，這使得毛澤東很不高興。他感覺到許多同志都不認同大躍進背後的核心理念。此時的蘇聯正在朝着赫魯曉夫所謂「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發展，把重點放在科技、高等教育、培養官僚、和平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上，並試圖緩和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在毛澤東眼中，這是毫無原則地妥協，是蘇維埃官僚向帝國主義世界低頭的表現，這無異於重新回到以政治精英為主導的特權階級這一固化結構上去。在他看來，這一切都是資本主義的復辟。毛澤東一向認為自己是徹底的革命者，與蘇聯的斯大林接班人截然不同，因此，他發動了對蘇的意識形態論戰，最終導致了中蘇關係破裂。

在毛澤東看來，他的許多同志在革命意識形態上有所動搖，蘇聯又改變了社會主義發展的方向，此二者一定有緊密的聯繫。1963年，毛澤東已經年逾古稀，是該到考慮自己政治遺產的時候了。斯大林死後才過了三年，赫魯曉夫就全面否定了他的政策，毛對此事耿耿於懷。毛澤東相信，雖然他的同志不會把他從主席的位置上趕下去，但他們可以坐等自己去世並淡出歷史舞台。毛不相信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同志會繼承他的革命遺志。而從1980年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上看，毛當時的擔憂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很精準的判斷。第九章是一個小結，講述了毛澤東在發動文革前做出的一系列準備。

毛澤東本可以輕易地一舉清除那些他認為對自己的路線不夠忠誠的人，但這並不是一次尋常的領導層清洗。與之同步的還有基層老百姓的「造反運動」，學生們身先士卒，我們在第十章將做討論。毛澤東動用大眾媒體，公開鼓勵高校學生造反派攻擊那些教職工中的「走資派」和庇護他們的管理人員。學生們組織起紅衛兵組織，不斷地以暴力方式攻擊

教員職工、學校領導，最終又將矛頭指向政府官員。他們的行為在大眾媒體上被大肆讚揚，毛澤東也在天安門廣場數次接見紅衛兵。安保部門和軍隊接到指令，不得介入。然而，紅衛兵自己卻四分五裂，有些人不願意遵從高層對運動的引導和控制，甚至開始攻擊執行毛澤東指令的官員。

這些問題讓毛澤東對學生造反派開始失去信心，1966年末，他決定讓工廠工人也參與到這場運動中來。在第十一章，我會對這一舉措的影響做出細緻分析。中國各大城市迅速陷入混亂的無政府狀態，許多工人要求漲工資、提高福利政策。另一部分人則被鼓動起來，對抗造反派的攻擊，維護地方政府的權威。大街小巷上，不同派系相互爭鬥。到了1966年底，絕大多數的省級政府都到了崩潰的邊緣。面對着可能即將到來的社會癱瘓，毛澤東指揮地方造反派奪權，與忠誠於毛澤東的官員們團結起來，一同取締地方黨委並恢復社會秩序。這一舉措的典範就是上海一月革命。大批造反派工人和當時掌控宣傳機器的張春橋聯合起來，在毛澤東的授意下，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建立起新的政府模式，在軍方的支持下恢復了社會秩序。張春橋的奪權獲得了中央的認可，被認為是人民的勝利和毛澤東革命忠懇的體現，人們將其視作藍本，認為能以此勝利地結束文化大革命。

然而，勝利並沒有到來。全國各地的造反派為了奪權，很快就陷入劃分陣營、你爭我奪的派系鬥爭之中。中央希望軍隊能起到幫助作用，結果軍隊要麼強行鎮壓擁護毛澤東的造反派，在中央面前失信；要麼捲入地方派系鬥爭之中。中央的指令有時模稜兩可、含糊不清，有時又猶豫不決、缺乏果斷。到1967年夏天，地方鬥爭終於失去控制，彷彿回到了內戰時的局面。

毛澤東不得不動用軍隊，實施軍事管制。1968年，大眾造反和奪權運動結束，這一嘗試以失敗告終。第十二章按時間順序列舉了軍方為恢復秩序所做的一系列強制舉措。軍隊將不肯甘休者視為反革命分子，在全國範圍內強制恢復秩序，不容許任何反對行為的發生。數百萬人被調查、關押和刑訊逼供，這就是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要在

全國清除一切形式的異見分子。大學校園空無一人，學生們都被送到農村進行無限期的「再教育」。教職員工則被解職，在鄉下從事重體力勞動。政府官員被大批送到農村勞動改造，或是去工廠車間參與生產。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此時達到頂峰，人們跳着「忠字舞」，表達着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熱愛，每個工作日早晨都對毛澤東的畫像頂禮膜拜，「聆聽他的教導」。

13 這一系列運動到1971年9月才停下來，第十三章將介紹中國在此之後的動盪時期。林彪元帥公開支持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因此受到嘉獎，被提拔為黨內第二號人物，成為毛主席「最親密的左膀右臂和指定接班人」。不料，林彪卻在此時死亡。官方的說法是林彪在刺殺毛澤東的陰謀敗露後，慌忙逃往蘇聯，但是遭遇飛機失事而身亡。文革運動在過去的五年裏造成了史無前例的破壞，發動文革的正當性現在已變得千瘡百孔。

巨大的轉變緊隨其後，軍方開始從民政部門撤出。文革期間，國家總理周恩來極力消滅其政治破壞力，因此受到毛澤東的擁護者頻繁攻擊。現在，周恩來獲取了毛的授權，開始着手修復文革帶來的創傷。黨的組織被慢慢地重建起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不像以前那麼狂熱了，公開的崇拜儀式逐漸減少。大學開始召回教職員工，小範圍恢復招生。文革期間數以百萬計的政府官員被下放勞作，現在也官復原職。雖然劉少奇等人在文革中去世（劉在獄中死去），像鄧小平這樣的國家領導人還是熬過了文革的動盪，重新回到原先的要職上。

安定的局面並沒有持續多久，早些時候的問題並沒有被根除，現在又以衝突的形式顯現出來。民眾可以公開批評林彪的作為，許多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和早些時候的活動者借此機會表達對整場政治運動的不滿，間接地批評了毛澤東的政策。先前的紅衛兵、造反派和被下放的學生們發起了許多小型的獨立思想組織。黨內高層在毛澤東政治遺產的問題上又開始明爭暗鬥，下面的人也跟着製造衝突，派系鬥爭和遊行在各大城市又出現了。不斷發酵的事態在1976年4月4日和5日達到了白熱化的階段，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和其他城市，人們發起紀念周恩來的活動，這

位共和國的總理在不久前剛剛去世。這些紀念活動很快就演化成一場公開的批判，人們指責那些違背周總理意願，執意推進文革的官員。作為回應，鄧小平再一次從領導人的位置上被撤了下來。

毛留下了一個飽經破壞的落後國家。在第十四章，我分析了毛澤東去世時中國各方面的情況。儘管遭遇大躍進之後經濟急速下滑，和1960年代晚期緩速衰退，中國經濟在毛澤東去世時還是在增長的。但此時的中國遠遠落後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更不用說追趕日本、韓國和其他東亞經濟體。工廠工人的平均真實收入自1957年以來一直在下降，城市居民的居住條件也非常糟糕，人們住在擁擠而髒亂的公寓裏，廚衛設施都是共用的。配給制依然運行着，消費品常有斷貨現象，部分商品的供應還不及1960年代水準。大學教育體系幾近癱瘓，公共機構的行政管理也無法發揮功能，因為有能力者被邊緣化，政治敵對常常一觸即發。生產線等資本設備陳舊，產品設計還是1950年代的老樣子。許多農民依然處在赤貧狀態，根據中國官方的標準，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膳食水平在亞洲幾乎墊底。

毛澤東去世時的中國千瘡百孔，想要修復，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毛澤東在世時給國家留下的破爛與落後，敦促其繼任者們開始重新思考國家建設的走向——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機遇。毛的接班人抓住了這一機遇，否定了毛的核心觀點，選擇了市場機制和私營企業，這在毛澤東在世時是不可想像的，因為對二者的反感是蘇維埃式經濟的核心概念，自1950年代以來就被奉為圭臬。當歷史的塵埃終於散去，中國轉型為依靠出口增長的東亞大國，並幫助共產黨得以重建，再次煥發生機。如果中國的領導人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政策中的嚴重問題，改革不可能有如此之規模。繼任者們的改革並不是毛所希望留下的政治遺產，事實上恰恰與毛澤東的初衷南轅北轍。